

泛阿拉伯主义的想象与凝视——论爱敏·雷哈尼的阿拉伯游记

严子豪

华威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 英国·考文垂

摘要: 阿拉伯文学“旅美派”先驱爱敏·雷哈尼在其游历阿拉伯诸国后写下的三本游记一般不认为是他较重要的作品。结合历史分析和作者传记来分析文本, 可以发现这三部游记包含了他作为移民知识分子对于奥斯曼秩序崩溃后的阿拉伯世界如何跨越宗教纷争走向现代化的认识。这三部游记在评述旅游所见民风民情的同时想象和建构了跨越地缘和族群的阿拉伯民族共同体, 展现了 20 世纪初泛阿拉伯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 爱敏·雷哈尼; 游记; 泛阿拉伯主义; 现代化

Imagination and Gazing as a Pan-Arabist in Travel Writings on Arab Country by Ameen Fares Rihani

Yan Zihao

School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rwick, United Kingdom Coventry

Abstract: The three volumes of travel notes written by Ameen Fares Rihani, a pioneer of the "Al-Mahjar" school of Arabic literature, are generally not considered a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While these works contain his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Arab countries go together beyond religious disputes and run to modernization after the collapse of Ottoman order as a migrant intellectual in analysis with history and biography. These travel writings not only comment on the folk customs and feelings seen in tourism, but also imagine and construct an Arab national community that spans geography and ethnic groups, showing the inner world of pan-Arabism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Keywords: Ameen Rihani; Travel writing; Pan-Arabism; Modernization

0 引言

爱敏·雷哈尼 (Ameen Fares Rihani, 1876-1940) 被认为是阿拉伯移民文学的先驱, 和哈利勒·纪伯伦 (Gibran Kahlil Gibran) 一样是阿拉伯文学“旅美派”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家庭, 青年时移居美国, 成为最早出版英文作品的阿拉伯人。他同时用阿拉伯文和英文进行创作, 在美国阿拉伯移民的报纸、杂志上发表创作的诗歌和政论文章, 并将文章集成在黎巴嫩出版。雷哈尼 1910 年回乡幽居期间创作的小说《哈利德之书》(The Book of Khalid) 被认为是最早的阿拉伯裔英语小说。雷哈尼在成名之后致力于政治事业, 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参与到鼓舞黎巴嫩脱离土耳其掌控、促进阿拉伯诸国形成联合体、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事业中。从 1922 年起, 他游历阿拉伯世界, 和阿拉伯诸国的统治者亲身交流,

并参与阿拉伯诸国战争调停、国家边界划分、建立泛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事务中, 留下了大量的一手文献。

从 1924 年起, 雷哈尼根据自己游历阿拉伯国家的经历, 相继以英文出版了《阿拉伯的伊本·沙特: 他的人民和土地》(Ibn Saoud Of Arabia: his People and his Land)、《游历阿拉伯沿海》(Around the Coast of Arabia) 和《阿拉伯山峰和沙漠》(Arabian Peak and Desert) 三本游记, 这三部作品所描述的地域几乎涵盖了全部西亚阿拉伯地区, 被称为“游记三部曲”, 在商业上获得了很大成功。然而, 在文学史家对雷哈尼的记载与批评中, 无论是对这三本游记, 还是对他阿拉伯之旅中表现的政治文化意图都鲜有关注, 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他在美国发表的杂文和小说《哈利德之书》上。因为在 20 世纪初, 游记在文学研究中往往被归为非虚构作品或者抒情散文, 这类文体的艺术

价值和文化价值还未得到重视。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旅行文学和旅游文本的价值被文学研究界深入发掘,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后殖民研究的兴起揭示了旅行文本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话语。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家在基于“陌生化”理论思考什么是文学时,首先发现了大量记叙旅行经历的文本既是客观记录,又像小说一样有主观审美性^[1]。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了大量东方学者的旅行记录、民族志书写是如何服务于西方文化的权力结构的,“空间需要情感来补充,甚至需要通过某种诗学过程的理性加以补充,由此空洞无实的距离被我们赋予了意义和内涵^[2]。”这使得大量旅行文本不仅仅被视为非虚构的记录,而是作为文化意识形态建构与博弈的场得到重视。萨义德之后的后殖民理论家延续了对中东地理文本进行话语分析的传统,并且热衷于寻找移民作家、混血作家、帝国少数族裔作家等边缘群体的地理文本,发掘帝国主义视角之外的描述中东地理文化的可能性。爱敏·雷哈尼的游记就可视为含有丰富文化意蕴的文本,不同于东方学家将阿拉伯世界他者化、本质化的书写模式,雷哈尼始终坚持着阿拉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以泛阿拉伯主义的政治理念观察和评判20世纪初的阿拉伯世界状况。同时,经受西方教育成长的他又难免会受限于西方现代化的进步主义视野。他游记里混杂着身份认同、文化价值体系的矛盾,也代表了20世纪初阿拉伯移民作家对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政治格局的思索。

爱敏·雷哈尼能被记入文学史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阿拉伯裔移民群体身份意识的苏醒。在“911”事件后,美国出现了严重的伊斯兰恐惧情结和对阿拉伯族裔的妖魔化、污名化。由于巴以冲突、黎巴嫩内战导致的20世纪后期阿拉伯移民,“与第一、二代阿拉伯移民后裔一起,开始建立美国的阿拉伯裔组织,并自觉维护阿拉伯传统观念和西方大众媒体中的阿拉伯民族形象^[3]。”大量阿拉伯裔知识分子为了给族群正名、消除偏见和歧视,开始发掘阿拉伯裔美国文化名人、谱写阿裔群体的历史。雷哈尼的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因此得到发掘,并被载入大量阿拉伯裔美国文学史著作中。可惜的是,这些文学史的文艺批评还是聚焦于雷哈尼的小说和诗歌创作,没有对他的游记作品进行分析。雷哈尼的阿拉伯游记既是他政治实践的记录,又展示了20世纪初见识过西方文化的泛阿拉伯知识分子是怎样看待卷

入全球化的阿拉伯世界的。在中东局势愈发动荡的今日,雷哈尼的记录或许能给思考中东问题提供一定启示。

鉴于当前雷哈尼研究的缺漏,本文将分析爱敏·雷哈尼的三本英文游记中所聚焦的人物,包括他所刻画和分析的阿拉伯列国领袖和底层社会生态,结合雷哈尼总结自身思想理念的英文杂文集《视觉之路》(Path of Vision),探讨雷哈尼是如何通过游记的形式来进行政治抒情的,展现有移民经历的泛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借助对这些文本的分析,也可以揭示阿拉伯文化在其现代化历程中的面临的掣肘和机遇。

1 现代化的凝视:雷哈尼游记的观察对象

雷哈尼在三部游记中叙述了他周游一系列阿拉伯国家、与当地领袖、居民交谈的所见所闻。他不仅像一般的旅行文学那样详细生动地记录了中东各地的自然环境、社会风俗,还重点描写了自己和几个国家的君主、领袖交往的来龙去脉,透过这些领袖执政的关怀和面临的困境,展现了阿拉伯世界在接触了欧洲的科技和殖民主义后艰难的现代化历程。

作为一位怀有政治责任感的旅行者,雷哈尼的旅行不仅仅是对阿拉伯世界的被动的发现,更是带着主观色彩的观看。在对于旅游行为的研究中,社会学家约翰·厄里指出,旅游者不是完全出于探索未知的欲望而旅行的,还带着对见证既定元素的期待,“旅游经验往往带有一些面相或元素,可诱发跟平常之下十分罕见的愉悦经验。”^[4]¹⁸而对于雷哈尼来说,他期待的元素、观察的焦点就是那些阿拉伯国家是否具有摆脱宗教派系斗争、摆脱落后的传统文化束缚、发展成现代国家的潜力。在旅行所有国家里最封闭保守的也门时,见到了当地社会封闭落后的状况,雷哈尼作出过感慨,“我必须承认,我对我在路上遇到的一切社会和政治的东西感到厌恶——作为一个热爱自己的人民,渴望看到他们和他们的国家走出陈规,走上进步道路的阿拉伯人,我感到厌恶。甚至在萨那,我也感到厌恶和困惑;因为在成为伊玛目宠爱的对象之后,我就成了他怀疑和怀疑的对象^[5]。”可见,雷哈尼的观察视角带有一定的进步主义色彩,他将阿拉伯世界在20世纪初的落后很大程度归结于这些国家封闭的宗教治理和与欧美科学的脱节。进一步分析雷哈尼在游记中记叙的观察对象和对其价值评判,可以更好地了解他的现代化立场。

1.1 领主与秩序

三本游记重点刻画了三位阿拉伯领袖：统治汉志王国、占据麦加的侯赛因国王（*حسين بن علي*），占据内志地区、瓦哈比教派的领袖伊本·沙特（*الرحمن بن فيصل آل سعود*），占据也门地区的叶海亚伊玛目（*حميد الدين محمد الدين المتوكل عبد العزيز بن عبد حميد الدين محمد المتوكل*）。他们在各自的统治范围内容纳了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奉行不同的对外政策。在见到三人前，雷哈尼详细描写了欧洲传闻中这些领袖的恐怖形象：与英国保持良好商贸关系的侯赛因国王在西方世界眼中充满了神秘感；而支持圣战、以武力攻城略地的伊本·沙特则被西方人视为战争狂；完全拒绝非穆斯林入境的叶海亚治下的也门则被英国对外人员描述为文明人不可进入之地。但在接触了几位统治者后，雷哈尼尽可能地对他们的形象进行祛魅。他首先指出这些统治者并非是陷于绝对封闭、不问外事的状态中，而是都关注着世界的变化，对于如何改造自己的国家有着独有的治理逻辑。汉志的侯赛因国王及其亲属与英国签订商贸条约，自身也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倡导者，对于西方世界的变化最为关注，他的国家因为占据了麦加而十分重视世界交通航线和贸易通路的安全和稳定，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媒体和电报机构扩大影响力。伊本·沙特饶有兴趣地询问作者有关美国制度、美国历史的一系列问题，自己收藏着一系列来自欧洲的工业玩具和艺术品。也门的叶海亚虽然表面上最为保守，但在与英国支持的亚丁诸部落交战后非常关注欧洲的军事工业，致力于寻觅获取战机的渠道来扩大领土。雷哈尼描写了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这些统治者是如何应对外在的变化的。他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汉学家那样聚焦于阿拉伯世界的异国情调，而是向读者说明这些伊斯兰君主施行不同政策背后的客观的因素。

在此基础上，雷哈尼试图建立一套价值体系来对这些领袖进行品评。他的评价尺度是在全球化发展迅速、欧洲各国既有科技又有野心的情况下，几位领主的政策和秩序能否稳定下去。侯赛因国王对于麦加朝圣的管理得到了他最多的赞誉。这位麦加的统治者既要利用朝圣奠定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又要用现代的科学知识来解决朝圣人员带来的诸多问题。作者记叙了他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为了避免朝圣者按照传统在井水中洗浴，他将沿路的水井用铁丝网封住，只用自来水管取水。他避免了科普微生物

的存在和朝圣者的信仰产生矛盾，这种兼顾传统信仰和科学需求的做法得到了雷哈尼的赞美。“埃林·侯赛因有一种更温和的智慧和更温和的改革方法。他很微妙，很有独创性。在不触及传统的情况下，他改变了传统的缺陷，而且常常是消除了传统的弊端^[6]。”对于伊本·沙特，雷哈尼则记叙了他是如何与保守的乌里玛阶层貌合神离、谨慎博弈的。而雷哈尼则对叶海亚伊玛目完全依照教法的治理表示了质疑，“事实上，他作为统治者的权力有三个基础，即：宗派狂热、本土自豪感和民族孤立^[5]。”“我也相信，如果伊玛目叶海亚的统治不是宗派主义的，而是纯粹的公民统治，他就会实现他最高的政治野心，而不必发动战争，并称之为圣战，反对他的穆斯林同胞^[5]。”由此，雷哈尼在对几位领袖的评判中为自己所宣扬的世俗化、反宗派化的泛阿拉伯主义提供了合法性。

1.2 医疗与知识

在雷哈尼对阿拉伯诸国的观察中，医疗卫生的相关制度是他的重点。在20世纪初，自然科学已经对微生物和传染病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则在很大程度上与伊斯兰信仰中对于疾病的解释相悖。因而一个阿拉伯国家能否超越传统，推行现代化卫生制度，可以展示这一国家有多大改革的潜力和平衡的智慧。

在前往汉志的旅行中，雷哈尼着重记录了埃及托尔的防疫站。这一防疫站原本是依据英国人的防疫规定所建，要求前往麦加、由麦加返回的朝圣者都得在此经受检疫才能通行。作者花很大的篇幅叙述了这一机构建设的由来和影响，“事实上，医学科学对伊斯兰教和世界的贡献是最大的。自从大约30年前建立了隔离区以来，埃及还没有发生过一次霍乱疫情。此外，它还教导穆斯林卫生和个人卫生。起初，他们对隔离的想法犹豫不决，对干扰朝圣感到不满，并强烈反对消毒过程；但他们已经逐渐接受了它，现在他们欣赏托尔无可比拟的优点^[6]。”雷哈尼还带着高兴的情绪记录了麦加里设置的两个现代化医院。现代医学能够在阿拉伯国家成功实施，对雷哈尼来说是验证了自己的阿拉伯现代化理想。而在宗教狂热的也门，雷哈尼则对当地完全依照宗教经典来看待疾病感到忧心忡忡。在与也门人萨义德的对话中，雷哈尼发现当地人不对传染病人进行任何隔离措施，“在伊斯兰教中没有传染病，安拉在经书中说，‘我会和麻风病人握手，而不用担心染上疾病’……我们的

信念就是我们的健康,疾病的传播是真主的命令,而不是传染病。你有没有想过,把病人隔离可能会阻止真主的旨意?那是亵渎神灵^[5]。”在对各国医疗状况的观察中,雷哈尼进一步把阻碍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原因指向宗教的狂热,期望阿拉伯人能够接受现代科学技术。

对医疗知识的接受也涉及阿拉伯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伊本·沙特和叶海亚伊玛目把医疗放任给宗教阶层也带有政治上的考量。在与侯赛因国王的对话中,雷哈尼发现引入现代医学隐藏的代价是外国力量的干涉,英国在投资麦加的医院时试图签订条约让英国政府专人负责对汉志医疗和防疫的维护,侯赛因谨慎地与其进行博弈,这也揭示了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另一个矛盾是掌握科技垄断的欧洲列强试图对中东政治进行操控。

1.3 教育与儿童

教育是雷哈尼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对于他所交往的所有领主,他都建议他们建立普遍的学校教育领土内所有的孩童,并提出不能局限于宗教教育,还应有普遍的科学和人文教育。而当他见到也门国王不仅把教育权全权交给伊斯兰扎伊迪派教士,还鼓励孩童从小进行武装训练以备发起圣战时,表达了自己的痛心。“但孩子们随即以可怕的音调提高了嗓门,像火箭一样射出了另外两个可辨认的词或押韵,即穆斯林和圣战军。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觉,我现在也不敢冒昧地告诉你。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一名圣战分子,我一直在与我内心的异教徒——丑陋战斗^[6]。”在雷哈尼看来,普遍的教育不仅是民生政策,还是西方文明的强大之源。在他发表的杂文中他写道:“人们渴望知识;事实上,更多的是因为它给人带来的快乐,而不是它提供的物质利益。专业化并不为人所知,至少不是生活的主要目的。所有教育的趋势和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知识分子,讨人喜欢的个性,有教养的人,他们可以在任何客厅,在法庭,在工作室,工作室和商店里自在地生活^[7]。”在内志与伊本·沙特交往后,雷哈尼一边赞叹他具有出众的世界视野,一边又将他无法摒弃的偏见归咎于教育,“在他的头脑里,除了那个黑暗的区域之外,没有任何水坑,那是他的种族几百年来不受教育的结果;在他的灵魂里没有黑点,除了那些由伊斯兰教独自造成的空虚^[8]。”雷哈尼似乎认为,局限于宗教教育将使得阿拉伯地区的儿童重复着宗派斗争、民族战争的命运。缺少对科学知识和

外界情况的了解催生了阿拉伯各地区狭隘的认知,而作者相信,开放的、现代化的教育既能够推动阿拉伯各国的和平,也能瓦解神权统治的基础。在雷哈尼与各国领袖的交谈中,通过讲述他们所感兴趣的欧洲史、美国史来劝说他们组成泛阿拉伯联盟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所理想的一种教育的过程。

雷哈尼对于现代教育的重视也和当时的国际主义环境和同时代阿拉伯裔移民的遭遇有关。雷哈尼在12岁时随家庭移民美国,在纽约的叙利亚移民社区中长大。叙利亚移民区实际上聚集了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多个阿拉伯地区、信仰多种宗教的居民。而彼时的美国也开始在民间兴办福利性质的教育机构、给予少数族裔移民更多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雷哈尼、纪伯伦等阿拉伯文学“旅美派”作家都是在阿拉伯裔族群混居的环境中,先接受美国教育、再回故乡学习阿拉伯文化的,因而能够摆脱阿拉伯多民族多教派的差异建立泛阿拉伯的身份认同。因此对雷哈尼而言,不依附于宗派的现代教育有助于在阿拉伯建立泛民族认同的意识。他对各国统治者教育改革的建议也蕴含着建设阿拉伯共同体的理念。

2 列强与导师:阿拉伯世界与欧美国家的接触与博弈

在爱敏·雷哈尼对阿拉伯各地区的观察里,详细地描写了20世纪奥斯曼秩序崩溃后欧美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渗透及其影响。一方面欧洲国家的中东战略干涉了他的旅程。在三本游记的开头,他都提及了作为知名人物进入这些国家都要经受英国政府的干涉和审查。鉴于他美国籍阿拉伯裔知识分子的身份,英国政府一度在边界上和保护国中阻碍他的活动,或者联系阿拉伯国家的外交人员制造对作者不利的谣言。以至于雷哈尼在和阿拉伯领主会见时总是要自证清白,表示自己既不代表美国的利益,也不是来传播基督教,而是力图带来海外阿拉伯人对和平事业的支持。另一方面,欧美国家错杂的利益网络也对他的泛阿拉伯主义政治活动造成阻碍。他试图让也门的伊玛目和亚丁各国在荷台达争端上达成和解、劝说伊本·沙特加入泛阿拉伯联盟的建立都因为英国的干涉而失败。

但另一边,雷哈尼又并非试图将欧美文明摆在阿拉伯文明敌对的位置,他依然劝说各国领袖与英国和其保护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并建立合作条约来引入现代

科技和教育。“但我到阿拉伯去，并不是要激起他们反对欧洲。我从美国来，也不是为了迎合武装上的狂热，或支持武装上的无知。相反，我们应该使无知和狂热认识到他们不能单靠武器生活。他们至少需要食物和衣服，通常还需要一个医生。是的，阿拉伯要自由和独立。但我们希望在这个国家看到学校、印刷机和医院、城市的卫生和家庭的清洁^[6]。”雷哈尼笔下的欧美各国既是充满野心的列强，也是值得交往和学习的导师。分析他对于各个阿拉伯国家外交的看法，可以看到20世纪初的泛阿拉伯知识分子是如何力图在东西方文明间架设桥梁的。

2.1 英国：对西欧文明两重性的想象

雷哈尼对于英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态度最为复杂。他的游记大量记叙了英国如何利用资本、媒体和武力渗透阿拉伯世界的行为。英国利用媒体创造汉志会把朝圣的穆斯林强制征兵的谎言、逼迫侯赛因国王接受建立租界的要求；设置大量伪装成外交大使的间谍控制也门周边地区；利用经济补贴使得巴林陷入债务、在政治上受限于它。但是，当雷哈尼向也门的叶海亚伊玛目提供发展建议时，仍然建议他和英国的势力达成开放性的贸易/外交协议：“你的国家应该向商业和旅游开放。如果没有与外界的现代联系，也门就无法前进；与英国签订一项条约，一项友谊和贸易的条约，如果它不损害贵国的主权和独立，毫无疑问，它将极大地造福贵国人民。我想，当英国人知道你和侯赛因国王为了共同的事业团结在一起时，你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好的条件^[5]。”

在雷哈尼的泛阿拉伯联盟理想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都扮演着双重身份，既是对阿拉伯各国实行殖民剥削的主体，又是庇护众多小国、弱势教派免于被吞并的保护人。他用《化身博士》中的“杰基尔/海德”来比喻列强的两重性，认为他们在外交和贸易中如同杰基尔博士一样操着文雅、平和的语言，但在背地里做着化身成科学怪人海德的恐怖实验，即试图剥削、吞并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但是，就一个阿拉伯国家而言，“现在，一个海德先生就没有两个海德先生那么可怕了。谈判还在继续，他（英国）一个人的时候，他身上很可能有更多的杰基尔博士的影子。”“我赞成让一个单身的海德先生来配也门，并推荐了那位英国绅士。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政治婚姻中——正如我所指出的，也门不可能永远反对婚姻——英国绅士，尽管更加

自私和深思熟虑，却比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要好^[5]。”

雷哈尼认为阿拉伯国家与英国结盟要好于接触法国和意大利，这一定程度上和他在故乡的政治失意有关。雷哈尼出身于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家庭。在奥斯曼时代，黎巴嫩作为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德鲁兹派等少数教派长期共存在黎巴嫩山谷中。而在奥斯曼秩序衰弱时，法国利用天主教教会鼓动黎巴嫩基督徒的宗教情绪、煽动黎巴嫩独立，这引发了奥斯曼和土耳其青年党也煽动伊斯兰极端主义来应对，最终导致黎巴嫩境内大量的宗教仇杀。雷哈尼的家庭就是在宗教恐怖的氛围中选择移民的。阿拉伯作家“旅美派”对于停止宗派斗争的呼吁也和法国、意大利的宗教政策有关。在法国利用宗教分化黎巴嫩人民的过程中，雷哈尼意识到西欧列强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分裂是危险的，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在复杂的局面中弱小的阿拉伯国家还是需要欧洲国家的“监督”来实现独立建国^[9]。而英国对于阿拉伯事务的干涉则较少运用宗教手段，更多是以经济补贴和军事保护建立势力，对于反对宗教斗争的雷哈尼来说是可以与之谈判的对象。

另一方面，雷哈尼对英国的妥协也基于他对英国“保护国”政策的复杂态度。在也门和受英国保护的荷台达谈判期间，英国允诺也门边境的各个部落大量黄金来获得他们在谈判上一边倒的支持，这实际上阻碍了也门和亚丁的和平谈判、加剧了也门的排外和敌意。雷哈尼对英国大使发出愤怒的表述，“我在驻地告诉他们，他们的黄金正在毁灭阿拉伯人，使他们变得更懒惰、更贫穷、更依赖别人。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继续发放津贴，无论数额多么小，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一种耻辱^[5]。”而后他又天真地提出建议，“今天，英国政府在阿拉伯所能奉行的最佳政策，并借此与阿拉伯人民保持几乎独一无二的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利益互惠基础上的政策——一项没有保护条款、没有津贴、没有任何政治标签或附加条件的友谊和贸易条约。例如，政治干事或代理人应由一名领事取代，其职责应严格限于领事^[5]。”在雷哈尼的思维里，英国政府对于这些它所扶植的小国和宗派仍然具有保护之功和培养现代阿拉伯国家的意愿，只是用错误的手段妨碍了和保守性阿拉伯国家的和平谈判。雷哈尼没有意识到，英国扶植阿拉伯少数派势力本身就不是为了庇护而是为了分裂中东国家，英国并不期望阿拉伯世界在一个泛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下和平

结盟。侯赛因国王对于英国背叛一战承诺的抱怨已经隐约揭示了这点，“英国人要求阿拉伯人在世界大战期间与盟军作战，阿拉伯人履行了这一承诺。作为回报，英国人承诺帮助阿拉伯人实现统一和独立；但他们不是，唉^[6]！”雷哈尼对于英国的中东秩序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显现出泛阿拉伯知识分子在一战后这一时间点的不成熟。历史最终证实了他的幼稚，是二战前后美德对英法殖民体系的破坏、阿拉伯世界的暴力革命才使阿拉伯国家彻底独立，继而拥有结盟和谈判的资格。

尽管如此，雷哈尼还是对英国秩序下阿拉伯国家能否现代化有一定的反思。在英国庇护的亚丁，他发现由于英国的外交利益，亚丁当局不会惩罚奴隶贩子，因为他们通常来自不受英国控制的国家，因此感叹道：“如果欧洲文明最伟大的遗产丧失了，如果它的道德和精神理想丧失了，那么欧洲文明有什么权利在东方存在，欧洲人有什么权利以它的名义存在^[6]？”雷哈尼已经开始意识到欧洲所提倡的法律、契约文明在殖民体系下的虚伪性，对于西欧国家的制度建设能否带来阿拉伯现代化有了批判性的思考。

2.2 美国：民族自决和人道主义的想象

对于美国的形象和美国在阿拉伯的活动，无论是雷哈尼还是他所采访的领主都给出了和西欧诸国截然不同的评价。在一战结束不久的时间点，美国尚未以武力参与对中东利益的瓜分，而是放任自身的基督教团体和阿拉伯裔移民团体在中东进行慈善性质的活动。对于阿拉伯各国的领主来说，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中独立成长为富有的强国这一形象让他们感到尊敬和认同。美国在彼时的阿拉伯领袖眼中形象良好，很大程度是由于一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倡的国际关系准则。威尔逊在一战期间主导了美国加入协约国的进程，并在几次演说中提倡建立尊重民族平等的国际联盟限制战争，提出并拥护“民族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他所主导的美国外交理念被称为“威尔逊主义”。伊本·沙特对于威尔逊的国际理念非常认同，“威尔逊是个伟大的人。正是他唤醒了世界上被压迫的小民族。威尔逊向他们展示了通往自由和独立的道路。他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特别是注入了东方人民的精神。他也让我们了解了美国。美国是弱国之母，我们阿拉伯人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有见识的人只需要有人指点他的路，这就足够

了^[8]。”对于这位苏丹而言，威尔逊的外交倡议尊重了阿拉伯人以自己的决议寻找出路的意志，因此是值得尊重的国家。

雷哈尼本人则在见证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活动轨迹后产生不同的看法。在雷哈尼的旅行里，在阿拉伯地区活动的美国人大多是清教的传教士。他们在进行慈善活动的同时也致力于传播基督教，这引起了雷哈尼对于宗教斗争可能破坏民族认同的警觉。在巴林的美国传教士发给穷人的食品和药物都要以《圣经》的书页包裹，这引发他的感慨，“如果这些善良的美国人不坚持在阿拉伯人中传播福音，他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拯救灵魂的事业在东方不再兴盛，在穆斯林国家也从未兴盛过。五十年的圣经教导，祈祷会，风琴和赞美诗，没有一个穆斯林皈依。那么，为什么要坚持这种愚蠢呢^[6]？”雷哈尼认为，美国社团强烈的宗教使命感能够催生跨国际的人道主义情感，由信仰导向慈善，这一点是值得认同的，“它应该激励一定阶层的人去从事一项从一开始就是基督教的，结果是人道主义的工作，这是很自然的^[8]。”但是，美国人应该放弃让阿拉伯人归化于自己的想法，聚焦在推动阿拉伯现代化的事业，这才是真正符合基督教理念的作为，“如果我们能教会阿拉伯人卫生和个人卫生，以及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能稍微改变他古老的观点，通过教育把他置于有益的基督教影响之下，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缺乏正确的基督教精神^[8]。”

与阿拉伯领主对于威尔逊主义的赞美不同，雷哈尼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国际人道行动内核里的扩张性。事实上，威尔逊主义在内容上虽然是一种具有理想性的和平外交倡议，它的提出却暗合了美国在巩固美洲霸主地位后想要参与主导欧非政治事务的愿望，“威尔逊向世人展现了一个18世纪晚期远在偏僻的北美的新生共和国逐步成长为区域霸权，进而谋求全球霸权的历史轨迹”^[10]，是对在此之前所奉行的偏安北美的“门罗主义”外交策略的修正。雷哈尼反感美国传教士对阿拉伯世界基督教化的尝试，反思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作用，这也是敏锐地察觉到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中隐藏的清教徒理念，威尔逊主义正是美国白人文化中“使命感”的一个表现特征^[11]。二战之后的历史验证了雷哈尼的担忧，带着美国有责任参与全世界的文明治理的思想，美国开启了武力干涉中东的进程，在冷战中推动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和对抗。

3 泛阿拉伯理想的失败：空洞的共同体叙事

尽管雷哈尼记叙了他所交往的阿拉伯领主如何在他的开导下开始认同泛阿拉伯联盟的理念，但他旅行结束后的史实则证实了这一理想的失败。在1925年，也门的叶海亚伊玛目放弃和英国谈判，攻下了荷台达。同一年汉志王国又被内志王国吞并，最后都成为沙特的一部分。直至今日，阿拉伯世界混杂了教派分歧、列强矛盾的残酷斗争仍在继续。对于身在局中的雷哈尼来说，他的政治理想失败是因为英法等国的操纵导致。但站在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他游记中所记叙的阿拉伯各国状况，已经显示出了泛阿拉伯主义无法在20世纪初实现的客观原因。

雷哈尼对于各个国家少数民族的观察、民间人士的采访显示，在彼时的阿拉伯诸国中，不同族群和阶层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在活动的地理环境中也存在着隔离，这种生活和地理的隔离又阻碍的统治者整合全国力量进行政治决策，使得一个共同体的认知哪怕在单一国家内都难以达成。贝都因人的部落生活和城镇居民的分裂尤其显示出这一点。在汉志和内志，如何驯服贝都因人成了统治者的难题。对于侯赛因国王来说，“城市阿拉伯人通常是商人，贝都因人通常是战士。两者对于国家的福利和王位的维护都是必要的^[6]”，他雇佣大量贝都因人作为士兵，因为他们在信仰上更为虔诚、更具有纪律性。但是相对的，他就不得不忍受沙漠里贝都因部落对于异教派游客的劫掠、对于公路建设的阻拦，花费大量金钱安抚他们，容忍他们在法律和判决上使用贝都因部落的裁决规则。

贝都因人的游牧习俗和信仰偏执又是由阿拉伯国家被沙漠分割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因此以20世纪初的科技条件，阿拉伯领主没有较好的办法使他们和城镇居民同化。沙特国王谈到了雨水问题引发的政治混乱，当八九月的雨季没有如期来到，牧草没能长成，干旱地区的贝都因部落就会攻打其他的部落，引发群体性迁徙和破坏。“这通常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政治与此几乎没有关系。阿拉伯中部的政治常常只是发动突袭或战争的借口^[8]。”

除了由地理因素造成的族群割裂外，阿拉伯国家历史上长期的分化治理也阻碍了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在也门，雷哈尼注意到统治者长期以奥斯曼时代的秩序，让犹太人定居在犹太人区（Ghetto），经营小规模商业、缴纳税收。

黑人则往往担任下层士兵和奴隶。雷哈尼对于犹太人受到的相对宽松的隔离政策是比较赞赏的，“这里我经历了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我对存在于曼哈顿东区，甚至布朗克斯区的贫民窟的看法完全被颠覆了，但我很高兴^[5]。”但是，“在身体和外貌上，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几乎没有区别^[9]，”族群分化的治理能够稳定实施，也就阻碍了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白人和黑人间产生了在同一国家内共同生活的公民意识。恰恰是长期遵守奥斯曼秩序中的族群分治政策，这些阿拉伯国家难以超越种族和宗教的边界形成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起源的学者宰因·宰因认为，奥斯曼帝国相对宽松的族群分治和泛伊斯兰秩序阻碍了脱离伊斯兰共同体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的诞生。当奥斯曼衰落、青年土耳其党上台，开始推行倾向于土耳其人的政策和叙事时，众多阿拉伯国家才相应产生民族独立意识，产生一种“对自决和政治独立的渴望^[12]”。

雷哈尼进行的泛阿拉伯主义游说则忽视了这些问题。他把团结阿拉伯人的努力寄希望于引导各国领主走向开明开放、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却忽视了恰恰是阿拉伯国家内部沉积的历史结构和地理族群上的分化导致各个领主采取保守的、宗教化的政策。雷哈尼试图建构泛阿拉伯民族共同体所用的方法是对“阿拉伯人”进行历史叙事。他在游记里回溯也门的扎伊迪教派、内志的瓦哈比教派时总要联系到阿拉伯世界整体的历史，试图指出陷于教义的分裂是违背了这些教法创立者的初心。而他自己则常常虚构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形象，甚至出现了历史学的错误：在游历腓尼基人的遗迹时，他使用真实性存疑的考古推断，认为精于航海、文化交流繁盛的腓尼基人是阿拉伯人的祖先，“真正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腓尼基人和阿拉伯人这两个民族之间有某些明显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航海家的技巧和勇敢，以及对贸易的热情，尤其是在海湾和红海沿岸^[5]。”由此感叹阿拉伯文明未来的发展应该重振腓尼基人的荣光、善于跟进世界潮流。将阿拉伯人和古腓尼基文明连接起来是一种族群建构的叙事。但是，虽然民族共同体也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的成立依然要依靠实在的、有迹可循的成员的共同生活经验，而非知识分子的想象。雷哈尼在汉志沙漠里和接待官员的对话就讽刺地展现了泛阿拉伯叙事的脆弱。在前往麦加的路上，雷哈尼将朝圣者与商队和阿拉伯世界联系起来，“古老的商队——一世纪向二十世纪

致敬。我们在去麦加的路上遇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从爪哇和苏门答腊，从印度和阿富汗，从摩洛哥和非洲的荒野，他们寻找永恒生命和幸福的源泉。肤色、种族和等级，就像陆地和海洋的距离一样，屈从于最高的目的，使朝圣者的世界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中走向一个独特的目标，一个沙漠中的圣地。麦加只有一杯微咸的水可以献给虔诚而疲惫的人们^[6]”。雷哈尼围绕麦加朝圣进行的泛阿拉伯建构，符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作中民族意识的一种起源，即在类似朝圣这样的大规模流动性行为中，大量不同个体以相近的语言和行为产生了共同的宿命感^[13]。但是，当雷哈尼试图把宗教共同体转换成民族共同体时，不同族群实在的差异就割裂了这样的叙事。他的旅伴很快就提醒他，将他们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隔离的沙漠就像海洋一样充斥着危机，“爱敏啊，这地的祸患是贝都因人和他们的骆驼。贝都因人和骆驼是进步的敌人。我们甚至不能因为贝都人而在吉达和麦加之间驾驶一辆高速公路^[6]。”当雷哈尼试图用历史的叙事塑造共同体时，现实中地理和族群的隔阂打破了他对于一个绵延、连贯的阿拉伯文明的想象。

今天阿拉伯世界的客观条件，则和雷哈尼记叙的 20 世纪初大为不同。由于科技的发展，由于沙漠造成的地理隔阂和贫困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对油气资源的开发让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都能进入国际能源贸易的商业网络中。围绕油气开放的工业生产和利润分配，也让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国民进入了具有相似性的现代化生活里。1960 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容纳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这意味着恰恰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和相近的生活方式，为阿拉伯国家之间超越教派进行谈判提供了可能。今天的阿拉伯共同体意识建立在影响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能源贸易网络之上，这一方面契合了雷哈尼所倡导的开明开放的现代化之路，另一方面又折射出早期泛阿拉伯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纯靠历史文化叙事打造共同体的天真。与此同时，现代化的阿拉伯共同体也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大国基于能源战略的渗透和分化、能源经济导致的贫富分化和政治制度动荡。阿拉伯人该如何团结、和平地发展，牵引着众多知识分子不断思考。

4 结语

在《阿拉伯的伊本·沙特：他的人民和土地》一书的

结尾，爱敏·雷哈尼用沙漠里建造水井的困境解释了阿拉伯各民族无法团结的原因。“在沙漠中造一座可以持续使用的水井，最主要的一项是有一个滑轮支架，但是这里没有一辆配有滑轮。旅行者必须有自己的绳子和水桶，或者，如果碰巧没有人在周末借给他自己的绳子和水桶，他就会空手而去。过去的战争孕育了这种不人道的感情。这些井今天是我的，明天可能就是我的敌人了。那我为什么要修理它们呢？因此，没有一个人在他的任期内感到安全，安全到甚至可以为轮子和滑轮搭建脚手架^[6]。”这段话隐喻的是，各部落、各宗派身上沉重的历史负担使得阿拉伯各国合作共赢的努力走向失败。作为一位移民西方的阿拉伯知识分子，雷哈尼投身于游说各君主建立泛阿拉伯联盟的政治实践中，希望用自己现代化、国际化的视野帮助阿拉伯各国造好一口可以让所有阿拉伯人共用的水井。今人在吸纳了当代史的视野后再来阅读他的游记，可以看到他在设计这口井时有哪些偏差，也能对如何推动阿拉伯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新的见解。

参考文献：

- [1] Percy G. Adams. *Travel Liter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ovel*[M].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 [2] Edward Said. *Orientalism*[M]. New York: Vintage, 1979.
- [3] 马征. 阿拉伯裔美国文学：一个有待拓展的新课题[J]. 外国文学动态, 2012(2):56.
- [4] 约翰·厄里. 游客的凝视[M]. 黄宛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5] Ameen Rihani. *Arabian Peak and Desert*[M].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1930.
- [6] Ameen Rihani. *Around the Coast of Arabia*[M].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1930.
- [7] Ameen Rihani. *Path of Vision*[M]. New York: James T. White, 1921.
- [8] Ameen Rihani. *Ibn Saoud Of Arabia: his People and his Land*[M].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1928.
- [9] Nijmeh Hajjar.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Ameen Rihani*[M]. New York: I.B. Tauris & Co Ltd, 2010.
- [10] 章永乐. 威尔逊主义的退潮与门罗主义的再解释——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观念之争[J]. 探索与争鸣, 2019(3):98.
- [11] 李青. 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理念及影响[J]. 国际关

系学院学报, 2006(4):29.

[12] Zeine N. Zeine. 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M].New York: Caravan Books, 1973.

[1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New York: Verso, 2006.

[14] Layla Al Maleh ed. Arab Voices in Diaspora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nglophone Arab Literature[M].New York: Editions Rodopi B.V.,2009.

[15] Wail S Hassan. Immigrant Narratives Orientalism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Arab American and Arab British Literature[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 石英. 从“哈立德”到“先知”——雷哈尼的英语创作解读[J]. 戏剧之家, 2017(7).

[17] 马征. 当代英语世界对爱敏·雷哈尼的挖掘和研究[J]. 外国文学动态, 2011(2).

作者简介: 严子豪(1998—), 男, 江苏苏州人, 华威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